

自由备忘录

苏晓康全景报告文学集

• 洪荒启示录

• 乌托邦祭

• 神圣沈思录

• 征狱

• 阴阳大裂变

——1950年庐山之夏



自由备忘录

——苏晓康全景报告文学集
本社编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责任编辑 王中忱
责任校对 李宗贤
封面设计 毛国宣
版式设计 张汉林

自由备忘录

——苏晓康全景报告文学集

本社编

*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
新华书店 发行
北京新华印刷厂 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13.25印张 2插图 291千字

1988年12月第1版 1988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30 000册

ISBN 7·5004·0544·8/I·63 定价：4.00元

编辑说明

苏晓康是近年来显示出独特探索风格的报告文学作家，他的作品，以深沉的忧患意识、恢宏的艺术视野，全景式地反映尖锐而重大的社会、历史问题，有力地拓展了报告文学的表现能力，在文学界和广大读者中间，引起强烈反响和争论。我们选择他的代表性作品和有关评论文章，汇辑成书，以供读者参考。这些作品和论文，有助于人们了解苏晓康报告文学创作的风格和特点，也有助于人们通过苏晓康这个文学“窗口”，窥探当代报告文学注重社会性、新闻性和全景性的发展与走向。今后，我们还将关注当代的重要文学现象，为当代文学的创作繁荣与理论建设，为广大读者了解文学发展的新动向，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。

1988年11月

目 录

● 苏晓康报告文学小辑

洪荒启示录 1

自由备忘录 41

神圣忧思录 92

阴阳大裂变 139

活 狱 205

“乌托邦”祭 240

目 录

我请求·····	冰 心 (348)
报告文学漫议	
——从苏晓康的创作谈起·····	冯 牧 (352)
文学与艺术的情思 (节录)	
——李泽厚和刘再复的文学对话 ···	李泽厚 刘再复 (366)
新时代的“救荒策”	
——读《洪荒启示录》的启示·····	蓝 翎 (371)
面对着道德文化解体的彷徨思绪	
——评报告文学《神圣忧思录》·····	吴国光 (378)
深沉的忧思	
——苏晓康报告文学漫议·····	贺兴安 (383)
科学与民主精神的张扬	
——从刘宾雁到苏晓康·····	谢 泳 (388)
望瓦尔拉夫之项背	
——报告文学的苦恼和出路·····	苏晓康 (400)
挽黄河狂澜于沉思之中	
——访苏晓康·····	刘梦岚 (409)

洪荒启示录·

——洪汝河两岸访灾纪实

1984年10月14日，新华社发出的一份内参送到中央各领导面前：

“……河南省驻马店地区从1975年8月板桥水库垮坝后，几乎年年受灾。据统计，受灾面积达二百万亩，受灾人口一百多万。今年麦季以来，洪河、汝河又先后五次决口，大水漫灌遂平、平舆和新蔡三县，一百多万亩庄稼绝收。频繁的水灾，给这些地区的人民带来了严重灾难。目前，新蔡县百分之八十的农户家庭设施全是泥：泥巴院墙泥巴房，泥巴桌子泥巴床，除了泥巴没家当。许多灾民仍住在75年8月特大洪水后搭起的简易草房和庵棚里。有相当一部分农户，靠人力拉犁、拉耙，有的甚至用钉耙刨地耕种……去年春季，仅新蔡县就有两万多人离乡讨

饭……今年秋季驻马店地区连续五场涝灾，目前已有三十万人缺粮。如不采取措施加以解决，到明年春季，缺粮、要饭的将会更多……。”

在八十年代的中国，把“逃荒要饭”这个概念冷丁从人们的记忆深处拖出来，已经变得十分刺耳了！当河南农村早已被描绘为“红薯换蒸馒头，光棍娶老婆”的今天，当报纸上焦急地为“兜里揣满大团结，两眼盯着百货楼”的河南农民呼吁的今天，当征购季节一到河南必定叫唤“卖粮难”的今天，当河南某地农民率先买飞机的新闻风靡全国的今天，当然，也是在全国农村到处冒出那些富得流油的“万元户”的今天，来自驻马店的灾讯就象万里晴空突然飘来一朵怪诞的乌云，把上上下下都惊动了。

要说中国地域辽阔，大河上下，北国南疆，闹点灾荒饥馑，本不足为怪。在农业责任制的优越性已经无可辩驳的今天，暂时性的天灾其实也并不可怕。可是驻马店这地方出现逃荒要饭，就又当别论了。如今四十岁以上的人（特别是河南人）大概都不会忘记，二十多年前，豫南富庶的信阳地区在经历了那场空前惨痛的“饥饿事件”后，北部十个县被划出重新组合为一个专区，行政公署设在京广线上一个名字古怪的小站——驻马店。这个五十年代末大饥馑的产物，自诞生以来从未摆脱过灾荒、饥饿的困扰，75年8月一场大洪水，又把它正在恢复的那点元气冲毁了……粉碎“四人帮”都八个春秋了，虽然中央的好政策年年把丰收在望的喜悦带给驻马店农民，可接踵而来的天灾照例又把他们推进饥饿的泥潭里！“饥饿”这个字眼从那里传来，怎不带着又苦又涩的历史联想呢？

胡耀邦、万里、习仲勋、胡启立等中央领导当即作了批

示。11月初，中央办公厅、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和民政部等国务院有关部委、河南省委派出的工作组，纷纷奔赴驻马店洪汝河两岸灾区……。

“你们河南又出逃荒要饭的喽！”

84年我正在北京上大学“熬文凭”，同学们把这不光彩的新闻告诉我，可我当时正在一门心思背《孟子·滕文公上》：“当尧之时，天下犹未平。洪水横流，泛滥于天下，草木畅茂，禽兽繁殖；五谷不登，禽兽逼人……禹疏九河，浚济、漯而注诸海；决汝、汉，排淮、泗而注之江。然后中国可得而食也”……且慢。这“决汝河”的“汝”，注释写明：“汝水，在今河南，东流入淮河。”不错，孟子说的正是今天的汝河，它发源于豫南山地，到新蔡境内与洪河汇流，入皖注进淮河。洪汝河两岸，的确是一片极为古老的土地，据说远古是东方夷族活动的地区，也就是炎帝神农氏的后代。舜时，那里出了一位伯夷，曾辅助大禹治水颇有功绩，想必治的就是这条汝水。可那地方似乎并不象孟子所说的，早在两千年前就“可得而食也”，远的不说，就在近五十年内，那里曾经两度变成饿殍野遍之地，一次是1938年至1942年间，“水旱蝗汤”四灾交加而赤地百里，烟火稀绝，满目蓬蒿，死者纵横枕藉以至饥民相食，汝河两岸遂成人间地狱；另一次呢，便是至今讳莫如深的1960年冬春之交的大饥谨，其惨状令人掩卷难书。话又说回来，倘若到了今天那地方竟然还是不“可得而食也”，可真要让孟轲掩面羞愧于千年之前了……我如此胡思乱想起来，背诵孟老夫子的心境顿时全给搅乱了……

第二年夏天一毕业，我就到洪汝河两岸去采访了。

一、丰年的灾讯

A.泥巴房、菜团子和槛楼的军棉袄

1984年11月3日上午九时许，当新蔡县饥饿的农民照例把红薯叶搅进锅里做早饭的时候，地区救灾办公室主任董振领着河南省长何竹康和中央工作组一行人，淌着又稀又粘的烂黄泥，走进河坞乡李湾村。

总算能让中央和省里来的领导亲眼看看，灾区老百姓过的是什么日子哟！董振知道，这洪汝河两岸年年闹水灾，各县的干部年年下来救灾，可那番冻饿寒号之状连同稀泥茅庵之苦，是很难传达到上面来的，即使到了他这一级，灾荒的面目也只剩下受淹亩数、缺粮户数这些抽象的数字概念了。大水一来，上面就要催报数字，基层干部都深谙此道，数字也信手拈来，报出了事。唉！年年夏秋几场水，年年泡坏沤烂老百姓收到手的庄稼，可人们的心肠反倒越泡越硬了。

深秋最后一场阴雨还在沥沥淅淅滴个不停。董振忍不住又在心里诅咒这可恶的阴雨，它几乎就是洪汝河两岸农民的灾星。今年的小麦原本长势很好，大部分也都割倒登场了，正在突击打场时，五月初五突然下起暴雨，眼瞅到手的麦子全都冲了、泡了、沤了，麦垛上长出了一层芽！农民赶紧种上大秋，巴望今年还能捞一季杂粮填填肚子，谁知八月中秋上游又下暴雨，大水汹涌面来，洪汝河漫淹倒灌，两岸一片泽国，人畜泡在水里十几天，牛腿柱子上的毛一撸就掉呵……大水过后，你就四周瞅吧：除了红麻、甘蔗和树枝还泛点青色，其它一片焦黄！

村里多少年来来过城里的官员了，李湾人已经记不清。

只有上年纪的人恍惚记得，1961年春天他们都饿得爬不动的时候，也来过这样一批人。此刻，他们都从那泥巴小屋或庵棚里钻出来，手里攥着发霉变黑的红薯干，有的干脆用衣襟兜一堆，一边机械地啃着，一边呆呆地瞅着那鱼贯而入的一群人。

黯淡、浑浊的目光里看不出哀怨，仿佛只有阴沉的冷漠。董振年年救灾下乡，年年在那些泥巴小屋的房檐下、在小车驰过的泥泞小路旁、在县招待所的食堂前，遇到这样的目光，只觉得它们一年比一年冷……。

“他吃的是什么？”进村后一直沉默的何省长突然问道。董振一看，前面有个老汉正捧着一个又黑又大的菜团子在啃，便走过去：“老大爷，你吃的这是啥？”“红薯叶掺点玉米面包的菜团子。”“你家连红薯干都没有了？”“不瞒你说，全沤啦！”

董振从老汉哆哆嗦嗦的手里拿过菜团子，掰了一小块递给省长，他觉得省长接过去时那手也有些微微颤抖。中央工作组的同志们也围过来，纷纷伸手去掰一小块，用纸包了装进皮包。他们想装去的，仅仅是一小块黑菜团子吗？

董振忽然悟到，眼前李湾人无意识地用沉默的目光和菜团子所诉说的东西，要比他年年向上报的灾情数字深刻得多。他四处一望，拉起一位随行的记者跑到另一个老汉面前：“来，你给这位老大爷拍一张。”大家都跟了过去。那老汉拄着一根棍子颤巍巍地站着，布满皱纹的脸上露出疑惑的神色：你们都围着我看个啥？原来，他身上披着一件面子已经脱尽、裸露着发黑的棉絮的破烂军棉袄。

“老大爷，这军棉袄谁给你的？”

“这？1975年8月发大水那年政府救济的呀。”

一件十年前的救济品！它那夹夹缝缝里连同老汉脸上的

每条皱纹里，藏着洪汝河两岸农民多少辛酸和贫苦呵。

看看吧，多看看吧！董振领着大家钻进低矮潮湿的庵棚，抓一把瓮子里所剩无几的红薯干，摸一摸老幼同食的破棉絮，坐一坐冰凉生硬的泥巴床。走着走着，他看到北京来的同志眼圈发红，有的正在悄悄抹去滚到眼角上的泪水……

我到驻马店拜访的第一个人，就是董振。

“我这个救灾办主任，年年朝上头喊穷、哭穷、要救济，那滋味不好受哇。”他说：“如今别处都是朝上汇报有多少多少‘万元户’，我却要汇报有多少逃荒要饭的。有啥法呢？咱这里真是连温饱二字都不沾边呵！我原籍就在新蔡，那地方历史上就是个老穷窝，连年水灾，‘泥巴院墙泥巴房，泥巴桌子泥巴床，’已经是两三辈人的老话了。百姓年年种庄稼，洪水年年来洗劫，国家拿了征购又返销，恶性循环没个头。1983年机构改革，我自报去搞救灾。那年春节前，上上下下的班子都在新老交接，要下的心里不舒坦，要上的情况摸不准，都把遭了水灾手中无粮的百姓给忘了。就在这当口，驻马店出了逃荒要饭。春节刚过，新蔡首先告急，有成千上万人外出逃荒。我大吃一惊，立即赶到新蔡，调查了近百家农户，几乎家家缺粮、断粮。我又到县城招待所和各个路口站着，看看究竟有多少要饭的——我那些可怜的乡亲们哪，三三两两，络绎不绝。这幅八十年代的‘流民图’，叫我怎么向地委汇报？……”

“后来呢？”

“后来还是如实汇报了。地委倒很重视，立即上报省里。接着新华社记者王彪来采访，将内参捅到中央，这下可就惹出麻烦来了。”

“怎么回事？”

“你还是去问问地委王德政书记吧。”

董振走后，我翻读一份新蔡县的材料。读着读着，仿佛觉得这些抽象的数字又向我提供了一种不同于泥巴房、菜团子和破烂军棉袄的宏观、历史的概念：从1953年到1984年三十二年间，国家在这个县征购粮食17亿斤，却又返销了14亿斤；1984年缺粮人口达36万之多，占全县人口的46%；三十二年来，平均每年向国家上交农业税130多万元，可反过来吃国家救济330万元；建国以来全县农民从国家贷款2400多万元，人均30元，而人均储蓄只有2元。稍有一点常识的人，都能从这些数字看出新蔡从政府到农民，家底已经破落到何样境地。

我想，过去大家都穷的时候，谁都怕谈富；如今都在富起来，却又都怕说穷了。即使象新蔡这种穷得逃荒要饭的地方，干部也都忌讳这“穷”字。这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呢？

B.第三位倒霉的“汝宁知府”

1984年岁尾，省委四道金牌从深圳催回了驻马店地委书记王德政。

王德政在信阳一下车，就匆匆赶到省委召开的救灾工作会议上。他刚迈进门，会议就结束了。人们纷纷起身的时候，他慌里慌张地喊了一声：“会议精神我们回去认真贯彻！”引起一阵哄堂大笑。

王德政愣愣地坐着。此刻他并不在意众人的嘲笑。他感觉到另一个更严重的迹象：平时就让他们这些地委书记们难以揣摸的那位上峰，此刻理都没理他就出去了。这种冷淡比嘲笑更让他寒心。

接着他才知道，那位上峰对这次新华社内参反映驻马店灾情非常恼火，认为是给河南大好形势抹了黑。“你们驻马店是怎么向记者介绍情况的？如果没有实事求是，就应该向中央写报告说明情况嘛！”

王德政懵了。很快他就意识到，他和整个地委此刻落入了一种极为尴尬和难堪的境地。是的，1983年春灾区出现逃荒要饭的严重情况后，他们就如实向上报告了。省里除了按常规给予救济外，没有更多的反映。可6月9日中央办公厅的一个文件则对驻马店出现的灾情提出了严厉批评：“遭受严重自然灾害、减产或绝收，这种事情年年皆有，在今天的条件下，完全可以有个较早的安排和解决，值得注意的是：一些地方的领导干部作风不对头，从而影响了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。”对此，地委认真学习后又写了《检查报告》报上去。接着就是记者王彪来采访，他们未敢稍有隐瞒。王彪写的内参，内容同地委上报的那份《检查报告》几乎一样。现在又要让他们出面否定王彪，这不是逼着驻马店地委自己扇自己的耳光吗？

第二天，王德政战战兢兢随着上峰到新蔡视察。一路上还是没人理睬他。送走上峰以后，阳历年之夜他在县委招待所喝了几盅闷酒，醉了。朦胧中，他想起了他的两位前任：1960年“饥饿事件”时期的信阳地委书记路××和1975年大水灾时期的驻马店地委书记苏×。在古称“汝宁府”的这块土地上，不到20年就有两个共产党的地委书记当了“阶下囚”，这在新中国历史上也许是罕见的。如今还不到十年，他这个八十年代的“汝宁知府”又面临厄运了。自然，他还不至于去坐牢，但下台恐怕难免了。他毕竟已经58岁了。罪名呢？他自己也很困惑。工作中的失误是有的，但同两位前

任相比最大的区别在于：他说了真话。

一个月后，他跟在上峰后面，兜里揣着一份违心炮制的万言“说明”，走进中南海勤政殿，就象一个不得不去向父母撒谎的孩子一样忐忑不安……

王德政后来没下台。

就在昨天董振坐的沙发上，隔着茶几，一双谨慎得有些迟钝的眼睛从茶色镜片后面瞅着我，仿佛思绪还滞留在逝去不久的那场虚惊中。王德政用浓重的胶东口音缓缓说道：“驻马店闹灾出了要饭的，我们工作没做好，心里很难受。可要堵着嘴不让我们说，心里就更受罪了。你也知道，驻马店这地方，五十年代说假话、搞浮夸是全国最凶的，西平县小麦亩产 7320 斤，那是全国头一号的‘巨型卫星’；遂平县嵒岈山又是全国第一个‘人民公社’；人们至今没有忘记这些臭名昭著的典型。那时的干部好大喜功，说假话、瞎话、大话脸不红、心不跳，结果 1960 年闹了个大饥荒，饿死多少人啊，侥幸没饿死的，连哭都不会哭，直到左倾纠正过来，老百姓才象从恶梦里迷瞪过来，清明去给亲人上坟，满山遍野的号啕哭声呵！可后来呢？1961 年民主补课，从地委书记一直抓到生产队长，再加上 1975 年大水灾那次又整了一大批。这一来，干部就走向另一个极端，谨小慎微，萎靡不振，报喜不报忧，一说出问题就心惊肉跳，自个儿赶紧先拨拉干净。你瞧瞧，折腾了 20 年，还是不敢说真话。我来这里，别的政绩不敢想，只想带个不说假话的头。咱穷，就得认帐。出了要饭的，也别瞒着。可没想到，这可就捅下大漏子啦。你想想，我这个地委书记想说句真话都那么难，下面就可想而知喽！”

一个地委书记说了真话还要被迫改口，此事发生在二十六年大批不愿说假话的干部被打成保守派、观潮派、算帐派甚至右派的河南，特别是就发生在五十年代末期曾经为了反瞒产、搞虚报而逮捕、拘留万人、整死千人的豫南这块土地上，怎能不让人深思呢？难怪1985年1月9日下午在中南海勤政殿里，一位中央领导同志对坐在圆桌北边的河南省委领导和王德政等人说：要让基层干部、群众说真话，如实反映情况。不能责怪说真话的同志，哪怕这个真话非常难听，也要听，兼听则明。否则，我们党就没有希望。这番话仿佛并没有责备谁，但它却让那些总把报忧视为大忌的人脸上发烧。

一个多月来象小媳妇一样敛气吞声的王德政，在勤政殿里才得到解脱。然而，此刻瞅着他那张依然愁眉不展的脸，我不由在想，我们党总得有个办法使人不愿说假话、敢于说真话才好，看来这事并不容易。

C.亲口尝过发霉红薯干的“揭短”记者

他通了天，揭了短。他也险些砸了饭碗。

1985年元月8日晚王彪心急如火登上16次特快时，已经顾不上细想等待他的会是何种命运。明天下午，他写的那份内参，将在勤政殿的圆桌上被仲裁：要么是他替驻马店灾民们反映了真情，要么是他谎报军情、搞假报道。后者的结果会叫他背上诋毁河南大好形势的罪名，使整个新华社在中央面前声誉蒙受损失。这种险境，新华社记者是常会遭遇的，但在河南分社，近两年来王彪却是头一个遇到的。

在分社里，王彪或许算不上出类拔萃之辈。他腿勤、笔勤，稿子发得不少，影响大的却不多。可这回倒好，一篇内

参，闹得上上下下象开了锅一样，某位省里的领导把分社社长叫去质问，还命令驻马店地委写报告反驳，怒气冲冲准备到中央同新华社打官司，那股势头，真叫大伙儿都替这王彪捏把汗：一个分社记者倘若惹翻了地方当局，就会成为“不受欢迎的人”，甭想在此地呆下去；何况他王彪还是个没有转正的预备党员呢！

王彪自个儿呢？心里就象打翻了五味瓶，酸甜苦辣啥滋味都辨不出来了。当初向他反映灾情的驻马店地委，在上面的压力下改口反嘴了。他感到一种被戏弄的羞辱，窝了一肚子火去找王德政，那可可怜的老头沮丧极了，周围干部几乎哀求他：“王彪同志，你就别逼我们王书记了。你是记者，大不了到别处去干，可我们怎么敢跟上面扛膀子呢？”王彪一句话没说，扭头走了。他只有独自承担责任了。20年记者生涯中，此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让他感受到“文责自负”这四个字的沉重和严峻。说实话，1984年8月份他奉命去调查灾情时，并没有过多地掂量这四个字，当时感情被那些透风漏雨的庵棚里一双悲苦的眼睛所折磨，心里只翻腾着一股不向中央反映就对不起灾区父老妇孺的欠债感，只奔突着当一辈子记者能有几回为民请命的一阵阵扪心自问……眼下，他能聊以自慰而不心虚的是，他毕竟跑遍了驻马店九个县，访问过二十多个受灾最重的自然村，亲口尝过被雨水沤烂的麦子和红薯，他没有说瞎话。在中国吃记者这碗饭，唱赞歌、抬轿子、吹大话、夸海口之类的营生干起来是最便当不过的了。1958年河南那些“巨型卫星”、“超级指标”，哪一项少得了记者摇唇鼓舌的催化和吹捧？甚至到今天，当1982年冬季新蔡正有两万七千多人外出逃荒之际，省报还在头版报道“新蔡、上蔡、平舆搞掉了三靠帽子”。想想1960年信阳大饥谨